

第一章 緒 論

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

一、 研究動機

書牘源起於三代，盛行於春秋，其內容不外抒情、說理、敘事、寫景，或四者兼而有之。歷代書牘於《文選》、《文集》中已大量選錄，故其文學造詣必有一定水準，在文學領域裡被視為日常生活之應用文學。錢穆曰：「書牘之難，人所難曉。……必求其自然，又皆不脫應酬人情，世俗常套，故極難超拔，化朽腐為神奇，自非有深造於文學之極詣者，實不易為也。」¹

古時書牘用於傳遞訊息，大都有特定收授對象，無論為交涉公務或談論私事，為能引起收信者產生共鳴附和，常動之以情，說之以理，將自己想法訴之文筆，使收信者感覺如促膝相談，如此真情，實為作者心聲之表現也。西漢·揚雄《揚子法言·問神》曰：「言，心聲也；書，心畫也。聲畫形，君子小人見矣。」² 魏·曹植〈與吳質書〉：「得所來訊，文采委曲，曄若春榮，瀏若清風，申詠反覆，曠若復面。」西晉·陸機〈文賦〉曰：「函緜邈於尺素，吐滂沛乎寸心」³ 把「書牘」一詞闡述得最為貼切的是梁·劉勰《文心雕龍卷五

·書記第二十五》曰：「大舜云：『書用識哉。』所以記時事也。蓋聖賢言辭，總為之書，書之為體，主言者也。……詳總書體，本在盡言，所以散鬱陶，託風采，故宜條暢以任氣，優柔以懌懷，文明從容，亦心聲之獻酬也。……贊曰：文藻條流，託在筆札。既馳金相，亦運木訥。萬古聲薦，千里應拔。庶務紛綸，因書乃察。」⁴ 近人傅庚生亦曰：「自來書牘隨筆之作，頗多可誦者，其情真也。」⁵

書牘亦可作為個人才華展現的工具，作者在痛快地傾吐自己的情懷之外，

¹ 羅聯添編：《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(三)》(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79年3月)，頁1019。

² (漢)揚雄撰，高時顯、吳汝霖輯校《揚子法言》(上海：中華書局，1936年據江都秦氏本校刊)，卷5，頁3。

³ (晉)陸機撰：《陸士衡文集》(明正德己卯(14年,1519)都穆覆宋刊本)，卷1，頁2。

⁴ (梁)劉勰著，(清)范文瀾註：《文心雕龍注》(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8年3月初版)，頁455-456。

⁵ 傅庚生著：《中國文學欣賞舉隅·真情與興會》(臺北：國文天地雜誌社，1990年4月初版)，頁14。

還可藉以騁才華，滿足文學的創作。同時藉書牘往來闡釋己見，展現說服才華，傳達思想，展露個性、氣質，樹立自己風範。

錢穆曰：「有意運用書牘為文學題材，其事當起於建安，而以魏文帝、陳思王兄弟為之最。……此等書札，特遊戲出之，藉以陶寫其心靈。古人云：嗟嘆之不足則詠歌之，此等書札，則詞多嗟嘆，情等詠歌，本亦宜於作為一詩，今特變其體為一封書札耳。故此等書札，乃始有當於純文學之條件。」⁶ 書牘有別於其他文學創作，為文學史中具有獨立地位之文體。

東漢紙的發明，使本為貴族化之書牘得以逐漸平民化，促使書牘普及至各階層，私人的書牘大量湧現，內容亦趨繁雜而豐富。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仍，社會動亂不已，人們身受顛沛流離之苦，在此環境下書信往來也透露著許多個人對時事的無奈，人生的見解，處世之大道，親友之懷念等感受，或抒情、或論理、或敘事、或寫景寓意……都寫得詞采雋永，情文並茂。因此，書牘這塊園地深深地吸引著筆者，引發筆者研究之動機。書牘一體在魏晉南北朝可說盛極一時，且成為我國文學發展史的重要階段，故選擇魏晉南北朝時代做為論文研究標的，訂定題目為《魏晉南北朝書牘研究》。

二、 研究目的

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文學的覺醒，書牘脫離了政治用途，內容莫不隨文真實坦蕩，敘述的情志意氣盤旋迴盪，字裏行間都充滿著個人的思想及行文風格。如西晉·羊祜〈誠子書〉為教導兒子修身之道、東晉·陶潛〈與子儼等疏〉為激勵兒子們相親相愛，強調團結互助之重要、劉宋·雷次宗〈與子姪書〉為教導子姪向學與修身。南齊·王僧虔〈誠子書〉為告誡兒女為學之不易，唯有真才實學才最可靠的道理。梁·簡文帝〈誠當陽公大心書〉為誠子修身要嚴謹，梁·元帝〈與學生書〉勉勵國子監諸生向學，皆強烈表現出儒學思想；西晉·阮籍〈答伏羲書〉、嵇康〈與山巨源絕交書〉文中充滿著離世玄學思想；魏·曹丕〈與王朗書〉、〈與吳質書〉，魏·曹植〈與楊德祖書〉、〈與吳季重書〉，西晉·陸雲〈與兄平原書〉，梁·蕭綱〈誠當陽公大心書〉，多論文學理論，有其文學思想。

書牘文體無一定之格式，或散文或駢文或駢散文並陳，如魏·曹丕〈與朝

⁶ 羅聯添編：《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(三)》(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79年3月)，頁1019。

歌令吳質書》、〈與吳質書〉，魏·曹植〈與吳季重書〉、〈與楊德祖書〉，皆以安閑清麗勝，是抒情的散文書札；又如劉宋·鮑照〈登大雷岸與妹書〉描繪旅途中美景，文筆綺麗崎嶇，寫景生動傳神，廬山的形體更寫得奇異傳神，色彩豐富，如同一幅五彩精工的山水圖畫，抒寫山川景物，同時寄寓胸中奇情，是篇精緻的駢散文；或如南齊·丘遲〈與陳伯之書〉、梁·何遜〈爲衡山侯與婦書〉、梁·陶弘景〈答謝中書書〉、梁·吳均〈與宋元思書〉、陳·周弘讓〈答王褒書〉、陳·伏知道〈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〉、北周·王褒〈與梁處士周弘讓書〉等，有抒情、有說理，其風格清新挺拔，文詞流麗，整齊中富變化之美，可視爲當代的駢文之名作。

書牘所載內容，有抒情、議論、敘事、體物之文，藝術風格更是可莊、可諧、能雅、能俗，甚至嘻笑怒罵，諷諭調侃，意到筆隨，所以書牘最適於表現作者的獨到見解、特殊心境、氣質及個性。在中國古代，史家爲立傳，作家自編文集，都鄭重地收錄，足見書牘之價值。

魏晉南北朝時代社會紛亂的背景，促使思想與文學大變化，各種思想與主張在書牘往來中可見端倪，論其描寫社會生活的廣度，探及人們心靈的深度，以及思想、藝術達到的高度，在中國古代的殿堂裡，都足以與其他文學並立而無愧色。歷代書牘，自春秋《左傳》即見著錄，《文選》而後，以其爲文學作品而大量收錄，其內容更是包羅萬象，無所不談，欲研究所有書牘，恐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。故筆者選擇從魏晉南北朝書牘中，以宏觀、微觀兼備多角度探討書牘中有關儒學、玄學、文學、美學的思想，希望對魏晉南北朝的書牘價值，有一更清晰的、更具體的、更完整的呈現，俾期有助於填補書牘園地研究之空白。

年間。

(二) 書牘界定

書牘源起於三代，盛行於春秋，梁·劉勰《文心雕龍卷五·書記第二十五》曰：

三代政暇，文翰頗疎。春秋聘繁，書介彌盛。繞朝贈士會以策、子家與趙宣以書、巫臣之遺子反、子產之諫范宣，詳觀四書，辭若對面。又子叔敬叔進弔書于滕君，固知行人挈辭，多被翰墨矣。⁸

在上古時代，一切以文字符號記事、記言的簡牘竹帛都叫「書」。到春秋戰國時代，列國紛爭，交往頻繁，當時人們把新出現的臣僚言事、故舊陳情、相互問訊、辨嫌疑的一類文字也稱爲「書」。如著名的樂毅〈報燕惠王書〉、李斯〈諫逐客書〉等，都是臣下寫給君主的，也都稱之爲「書」。明·吳訥《文章辨體·目錄第二十六卷·書》曰：

按昔臣僚敷奏，朋舊往復，皆總曰「書」。近世臣僚上言，名爲「表、奏」；惟朋舊之間，則曰「書」而已。蓋論義知識，人豈能同？苟不具之於書，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？⁹

秦統一六國之後，把臣僚向皇帝言事的文字改稱爲「奏」。到了漢代，詳制禮儀，又進一步按內容不同分爲「章、奏、表、議」四品，籠統名爲「奏疏」，這是與書牘不同的另一種文體，故不在筆者研究範圍之列。

清·姚鼐輯《古文辭類纂·序目》曰：「書說類者，昔周公之告召公，有〈君奭〉之篇。春秋之世，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，或爲書相遺，其義一也。戰國說士說其時主，當委質爲臣，則入奏議，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，則入此篇。」¹⁰ 異地溝通曰「書」，當面規勸曰「說」，故合爲「書說類」。但書信可泛指一般人與人之間，而此處之「說」僅限於君臣之間，並且必須是異國君臣，且所議之事，必須是軍國大事，個人之間傾訴衷曲，可稱之爲「書」。

⁸ (梁) 劉勰著，(清) 范文瀾註：《文心雕龍注》(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8年3月初版)，頁456-457。

⁹ (明) 吳訥編集：《文章辨體》(明嘉靖三十四年(1555)湖州知府徐洛重刊本)，頁33。

¹⁰ (清) 姚鼐輯：《古文辭類纂》，(清道光間合河康氏刊本)，冊1，頁5。

清·曾國藩輯《經史百家雜鈔·序例》云：「書牘類，同輩相告者，經如〈君奭〉及《左傳·鄭子家、叔向、呂相》之辭皆是。後世曰書，曰啓、曰移、曰牘、曰簡、曰刀筆、曰帖，皆是。」¹¹按呂相之辭，乃指春秋晉卿呂宜子絕秦之外交辭，並非私人書信，應列入公文書中。而「移」亦非私人書信，其性質與「檄」相近，乃公文書之一種。¹²故亦不在本論文研究範圍之列。

姚漢章、張相《古今尺牘大觀書·例言》曰：「書、啓、牋、簡、札、狀諸名，文人沿用，性質雖同，而綜覈名實，則陳義或失之寬博，古人於書，上下同詞，或曰賜書或曰上書，頗涉君臣尊卑之意；啓爲官信，見於通俗文；牋爲表類，所謂公府奏記，郡將奏牋是也；簡之爲言，起於簡書，亦與後世公府行文之札相近；狀之體質，尤近官府，凡此定名，衡之酬應之用，均嫌弗確，惟《漢書·陳遵傳》云：『與人尺牘，主皆藏去以爲榮。』揆其施用，限於朋輩，尺牘一名，義較蕪絕。文字之中，於尋常實用最有關係者，莫如尺牘。」¹³

書牘名稱紛歧，筆者援《經史百家雜鈔》的文體分類，名之曰「書牘」，其別名包括「上書」、「牋」、「啓」、「疏」、「書」、「簡」、「牘」、「帖」等，茲簡述如下：

一、上書：上書應屬公文性質，爲奏議類，然非謂與君王書皆公文也。如陳孔璋〈爲曹洪與魏文帝書〉，在盛稱漢中之土地形勢及用兵之道，洪爲文帝族父，彼此雖有君臣關係，以其輩分較長，故《文選》列之書類。

二、牋、記：梁·劉勰《文心雕龍卷五·書記第二十五》曰：「戰國以前，君臣同書。秦漢立儀，始有奏表；王公國內稱奏書。迄至後漢，稍有名品，公府奏記，而郡將奏箋(牋)。記之言志，進己志也。箋者，表也，表識其情也。」又曰：「原箋記之爲式，既上窺乎表，亦下睨乎書，使敬而不懼，簡而無傲，清美以惠其才，彪蔚以文其響，蓋箋記之分也。」¹⁴范文瀾注曰：「謂敬而不懼，所以殊於表(表有誠惶誠恐，死罪死罪之語)；簡而無傲，所以殊於書(上文云，

¹¹ (清)曾國藩輯：《經史百家雜鈔》，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72年)，頁1。

¹² 張仁青編著：《應用文》(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2005年9月第3次修訂)，頁248。

¹³ 姚漢章、張相纂輯：《古今尺牘大觀》(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66年3月臺二版)，上編一，頁1。

¹⁴ (梁)劉勰著，(清)范文瀾註：《文心雕龍注》(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8年3月初版)，頁456-457。

書體在盡言，宜條暢以任氣，則有類乎傲也。)這是箋的特點。」¹⁵ 由此可見，「箋」或「牋」是郡將所上的奏書。後來凡寫給上級的公文、書信統稱為「牋」。如魏·吳質〈答魏太子牋〉、魏·楊脩〈答臨淄侯牋〉、魏·陳琳〈答東阿王牋〉、晉·桓玄〈答會稽王道子牋〉、南齊·謝朓〈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〉，西晉·阮籍〈辭蔣太尉辟命奏記〉，或薦介、或辭謝、或稱頌、或勸誡，內容皆屬書牘類。

三、啓：梁·劉勰《文心雕龍卷五·奏啓第二十三》曰：「啓者，開也。(殷)高宗(武丁)云：『啓乃心，沃朕心』，取其義也。孝景諱啓，故兩漢無稱。至魏國箋記，始云啓聞。……自晉來盛啓，用兼表奏。」¹⁶ 如南齊·王融〈謝武陵王賜弓啓〉、〈謝竟陵王示扇啓〉，南齊·謝朓〈謝隨王賜左傳啓〉、〈謝隨王賜紫梨啓〉，皆言情之書牘類。

四、疏：《說文》曰：「疏，通也。」梁·劉勰《文心雕龍卷五·書記第二十五》曰：「疏者，布也。布置物類，撮題近意，故小卷短疏，號為疏也。」¹⁷ 如魏文帝〈與吳質書〉云：「書疏往來，未足解其勞結。」、劉宋·陶潛〈與子儼等疏〉、梁·昭明太子〈答晉安王書〉：「得五月二十六日疏」、(北齊)顏之推《顏氏家訓·雜藝篇》曰：「江南諺云：『尺牘書疏，千里面目也。』」。

五、書：漢·許慎《說文解字敘》曰：「箸於竹帛謂之書，書者，如也。」謂如其文字之形而書之也。梁·劉勰《文心雕龍卷五·書記第二十五》亦曰：「書者，舒也。舒布其言，陳之簡牘。」¹⁸ 以「書」為「書牘」之名稱，最為世所習用。如本論文所謂的「書」都指「書牘」而言。

六、簡：《說文》曰：「簡，牒也。」段注：「牒，札也。木部曰：札，牒也。按簡，竹為之；牘，木為之，牒、札，其通語也。」「簡」是削製成的狹長竹片，後有以為書牘之代稱。如魏文帝《與吳質書》云：「書問致簡。」

七、牘：《說文》曰：「牘，書版也。」牘專謂用於書者，然則《周禮》之「版」、《禮》之「方」，皆牘也。聘禮注曰：「策、簡也，方、版也。李賢《蔡邕傳注》引《說文》而曰：長一尺。按漢人多云尺牘。」牘為用於書寫之木片，後引申為表示公文和書信。

¹⁵ (梁)劉勰著，(清)范文瀾註：《文心雕龍注》(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8年3月初版)，頁481。

¹⁶ (梁)劉勰著，(清)范文瀾註：《文心雕龍注》(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8年3月初版)，頁423。

¹⁷ (梁)劉勰著，(清)范文瀾註：《文心雕龍注》(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8年3月初版)，頁457。

¹⁸ (梁)劉勰著，(清)范文瀾註：《文心雕龍注》(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8年3月初版)，頁455。

八、帖：古無紙時，書寫於帛曰帖，其字與文一任天而行，極自然之致。世皆沿用為書信之通稱。

魏晉南北朝書牘凡一千多篇，筆者於本論文中選取其時期的代表作家凡八十餘名，一百八十多篇作品。分佈情形統計如下：

- 一、抒情類計五十九篇，其中計感慕十九篇、懇摯二篇、惋傷十四篇、恬淡七篇、側豔四篇、牢騷二篇、抒懷十一篇。
- 二、論說類計六十一篇，其中計論學三篇、論文卅五篇、論經二篇、論字九篇、論政三篇、論兵六篇、辯駁三篇。
- 三、敘事類計五十六篇，其中計薦揚五篇、辭謝一篇、祈請七篇、餽贈二篇、致謝五篇、稱頌四篇、責讓一篇、絕交二篇、陳述六篇、訓誡二篇、諷勸十七篇、激勵一篇、規戒三篇。
- 四、寫景類計五篇。

二、 研究方法

本論文以梁·蕭統編《文選》、明·張溥輯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、清·嚴可均輯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、清·許梈，黎經誥輯《六朝文絜箋注》為藍本，為使論理、敘事更周延，亦引用經、史、子、集類書籍以輔之，佐以相關的古代文獻、近人論著的書籍、期刊論文及碩、博士論文，以求資料完備。依魏晉南北朝書牘內容加以整理、分析，並運用歷史研究法、歸納研究法、分析法，針對書牘寫作背景、思潮作內在義理闡述，與外在形式的表達之研究，在每一章節的論述中，期能有較深入的表述。

茲條陳研究方法如下：

- (一) 為使閱者知人論事，且可以考見書牘之變遷，每一書牘之歷史背景，及其寫作時間，特參考清·孫星衍輯《續古文苑》做法，於每文標題均冠以作者之朝代、姓名，並仿清·嚴可均輯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，以卒年斷代，每朝之中亦復按其時代先後排置。人各附傳一則，文各注輯錄之所出。
- (二) 為研究方便，先歸納書牘的類別，再作為研究本文之取捨依據。古人寫書牘，並未事先立下目的，故一封書牘可能只有部分內容合乎

本文的取舍標準，這是以某一主題作研究所必然面對的有關作品篩選的顧慮，因此，本文對書牘的選取、分析，擬以具有象徵性、代表性者歸為一類，優先考量其作品整體內容的精純性。如丘遲〈與陳伯之書〉雖間有寫景描述「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長，雜花生樹，群鸞亂飛。」之名句，但因全文主旨在於勸降，故列入敘事類諷勸篇，而不列入寫景類。而為研究及演繹全文之便，在論述過程中，再列舉相關作品為輔，建構論點，以加強論據。最後依作家時代，寫書牘的之先後順序，在文後盧列總表，以供參酌。

- (三) 魏晉南北朝文人非常重視文采，主要表現在作品語言的辭藻、駢偶、音韻、用典，因此，駢體文學大量運用了語言因素，為評估當時書牘對後代之影響，以文學現象的角度，進行具體分析，以探討此一問題。



第三節 近人研究成果

書牘興盛於魏晉南北朝，歷代書籍已見收存，自《文選》而後，文章之總集及別集都以其為文學作品而大量收集，故書牘之流傳迄今之數量已逾千萬，其內容更是包羅萬象，無所不包。但研究者卻少，為何？人們都以為書牘為尋常親朋、好友、故舊間往返問候、表意之辭書，自無珍貴可言，故多所忽略，不加深究，遂使極有價值之書牘束之高閣。近人對書牘之研究寥若晨星，對魏晉南北朝書牘之研究更是屈指可數，雖非全面性，確已做到拋磚引玉之功效。茲列舉如次：

一、民國 67 年 6 月 謝金美 《古今書信研究》 國立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 碩士論文

其研究內容為概述書信之緣起、義界、稱名、存錄、分類與價值。書信沿革，先秦、兩漢以至當代書信演變概況，並論行文、格式與作品。書信之結構、修辭與作法。

本文蒐集極為豐碩，對書牘之價值及書信應用闡述著墨甚多，喚醒了現今學子對書牘研究的興趣，該文注重實用性是其最大特點，但有關書牘內涵研究不多，大都傾向於書牘之發展史，及書牘之分類等。筆者以為書牘之精義在於其內涵，作者思想之傳達。不同的時代背景，產生不同的觀點。

二、民國 83 年 6 月 林素珍 《魏晉南北朝家訓之研究》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

其研究內容為魏晉南北朝，世家大族在官學不振，重視家庭教育的時代背景下，家訓書牘緣起、發展影響、前人撰述家訓之目的、內容及家訓在當代的精神。並探討家訓對教育、倫理、社會及文學各方面之價值。

三、民國 85 年 4 月 康世昌 《漢魏六朝「家訓」研究》
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

其研究內容如下：

- (一) 分析漢魏六朝家訓之內涵，有助於瞭解這個時期家庭教育的訴求，及其實施方法。
- (一) 研究家訓的思想特色，有助於瞭解當時一般人對人生的態度。
- (二) 研究「家訓」文學，以瞭解漢魏六朝家訓的文體、情意及論理表現。

四、2001 年 4 月 柏秀葉 《漢魏六朝書信體散文論》
中國山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

其研究內容共分為五大部分：

- (一) 界定漢魏六朝書信體散文的研究範疇。
- (二) 論述漢魏六朝書信體散文的題材內容。
- (三) 分析漢魏六朝書信體散文的藝術特色。
- (四) 闡述漢魏六朝書信體散文的文學史意義。
- (五) 描繪漢魏六朝以後書信體散文串做的發展軌跡。

柏君認為書牘這塊園地仍待開發，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書牘方面，故云「歷史上對他的研究始終處於低谷」，與筆者認為魏晉南北朝書牘是中國文學浩瀚文章中一塊處女園地，所以嘗試去開發看法是不謀而合的。

柏君著重於書信散文方面前人所透露訊息，及當時文人整體綜合文風表現。

五、2006 年 4 月 孫丹萍 《兩晉尺牘文學研究》
中國山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

孫君著重於兩晉書牘的內涵，因此其作品著重於發現當時社會真象，反映

當時文人對時事之無奈，戰亂禍及親人，百姓流離失所，人心對戰亂憤慨不平，抉擇兩難之心境。他對八王之亂及當時文人對時事之看法，相關書牘研究頗為深入。其內容如下：

- (一) 西晉八王之亂，文人之心聲。
 - (二) 東晉時局北伐軍政與傷時嘆逝之無奈心境。
- 讀其論文猶如讀了一篇兩晉時代的歷史。

書牘領域猶如一塊新大陸，它無所不包，內容之豐盛猶如新大陸之叢林中蘊藏著的寶藏。如今總算有人注意到這塊浩瀚園地，且進行嘗試開發的工作，前人對書牘之研究都集中在家訓一類，對其他種類的書牘則甚少論述，而「家訓」正是書牘園地的一小角。當筆者觸及這塊園地時，真是驚喜不已，驚的是它的價值連城，喜的是它的內涵遼闊，這自然引起筆者無限之興趣，嘗試著一窺它的真貌。若以歷代書牘為研究範圍，畢竟能力不逮，因此以魏晉南北朝斷代為研究範圍，以期能在浩瀚書牘園地裡，闢出另一園地，填補前人研究之不足。

筆者為能將魏晉南北朝書牘所蘊涵之特色，及在文學史上的貢獻等闡述清楚，特廣為蒐集，其涵蓋面儘可能代表當時之文風，社會之狀況，作家之個性、品德、氣質及思維模式之背景。